

| 陈 | 鼓 | 应 | 著 | 作 | 集 |

耶稣新画像

陈鼓应 著

中华书局

| 陈 | 鼓 | 应 | 著 | 作 | 集 |

耶稣新画像

陈鼓应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耶稣新画像/陈鼓应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8.3
(陈鼓应著作集)

ISBN 978-7-101-11968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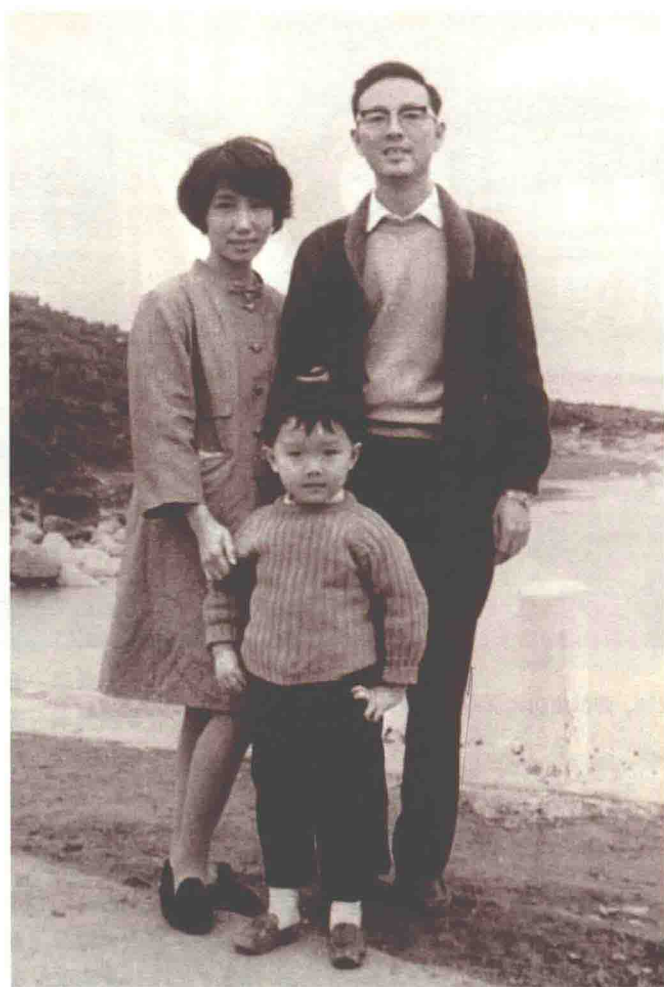
I.耶… II.陈… III.《圣经》-研究 IV.B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7095号

-
- 书 名 耶稣新画像
著 者 陈鼓应
丛 书 名 陈鼓应著作集
责任编辑 朱立峰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
201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920×1250毫米 1/32
印张6 $\frac{5}{8}$ 插页3 字数130千字
印 数 1-3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968-8
定 价 42.00元
-



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陈鼓应在北京芙蓉里寓所的书房内



年轻时的陈鼓应夫妇与儿子在台湾景美的家中

《陈鼓应著作集》总序

一

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，这期间，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。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，两者交互抵触，有时又能相互彰显——现实人生的坎坷，常使学术路途中断，但我“困”而知之，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，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。

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：一是学术专著，二是时感性的文章。后者将以《鼓应文存》为名，另外编成一个系列，包括《失落的自我》、《言论广场》、《台大哲学系事件》、《走进白色恐怖》、《台湾民主运动脚步》等著作。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。

我的专业著作，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。《悲剧哲学家尼采》是我的第一本书，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

基础,接着是《庄子浅说》,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《庄子今注今译》。可以说,从尼采到庄子,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。借着他们,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。

二

大学期间,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,我体会到,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,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。个体生命也是如此,正如叔本华所说:“一定的忧愁、痛苦或烦恼,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。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,便不会稳定,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。”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,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。

中青年期间,我常处于逆境中,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“困苦”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,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激励着我迎难而上,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。

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,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。到了七八十年代,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在那段时空中,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,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、文化上的反思。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,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,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,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。这一时期,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,都反映了“任其性命之情”的倾向。接下来,《道家的人文精神》和《庄子人性论》两书的内容,

又可以说是“安其性命之情”的展现。

三

《陈鼓应著作集》共二十本，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。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、庄的注译，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。1973年春夏，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、发表时论，我和王晓波在“台大哲学系”事件中首遭整肃。自此以后，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，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。

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，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，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，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，并在《哲学研究》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：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；第二是《易传》的学派归属问题；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。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《道家哲学主干说》的中心议题，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。

“9·11事件”之后，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，就像司马迁所说“天下共苦，战斗不休”，也像泰戈尔《演讲集》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：“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。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，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。”事实上，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。为此，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。中国哲学儒、墨、道、法各家，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，各有其普世的价值。这种普世价值，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，老、孔、墨、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

的情怀,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、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、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。

四

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,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。从我有记忆开始,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,导致平民死伤无数,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。

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,逃难、流离、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。然而,尼采的酒神精神、日神精神和《庄子》的“任其性命之情”、“安其性命之情”的洒脱心境,却赋予了我在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,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,寻找到精神的家园,在《庄子》的天地中,寻找到心灵的故乡。

五

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。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,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,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。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村新园寓所,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,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。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,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。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,我在此一并致谢。

最后,我要说明的是: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,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,此次汇编再版,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

的本子作底本排版；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，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，予以保留，不再另行撰写。

陈鼓应

2015年4月21日

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，时年八十

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

——《耶稣新画像》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

1964年左右,我在完成《悲剧哲学家尼采》和《庄子哲学》的写作之后,便开始着笔逐篇撰写《耶稣新画像》这本小书,历时多年,汇编成册。追忆那时的创作缘由,一方面与我身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,另一方面与我内心深处流淌着的人文传统相联。因此,《耶稣新画像》在1970年的出版,对我而言,既有现实意义,又有历史意义。

一、尼采说：“西方传统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血液”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,“白色恐怖”的高压由全岛蔓延至校园,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趋于高潮。同时,在太平洋的彼岸,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已迈进冷战思维的盛期,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平息,越战的火力又再次集结。通过军事的扩张与政治的干预,美国的宗教文化也随之渗透进台湾。美援所到之处,基督教

的势力就通过散发牛奶、面包和奖学金的方式，扩散到乡间和校园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整个六十年代，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。这一鼎盛时期的特征便是，教堂林立，校园团契盛行。当时，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，世界地图只有两个——台湾和美国。因而，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口号——“来来来，来台大；去去去，去美国”。可以说，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。

在这种大势所趋的环境中，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，我从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翻印为教材的西书中，接触到了尼采。随后，又因尼采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进入《庄子》，并旁及存在主义。在尼采的影响下，我也开始阅读《圣经》。尼采宣布“上帝之死”，提出“价值转换”与“价值重估”的划时代主张，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。

一进入尼采的思想领域，我被一句话瞬间点醒了——“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”。的确，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“理性单一化思考”，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我一股内在生命的驱动力，使我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。本书中，《星座中的独裁者》、《约伯的抗议》两篇便是对集权统治下的造神运动的折射。

进而，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，也引导我从不同的视角关照现实，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、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，具体而言，即是：为什么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强国，一面高频调地掀起自由民主的声浪，一面却又弥漫着政治的绝对性倾向与军事上的霸权作风。而这种深

层的反思就必须触及西方文明的根源、基督宗教的经典文本——《圣经》。

二、耶稣说：“我来，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”

不同于传教人士宣讲的教义，我从《圣经》文本中，体味出耶稣所具有的两种面向。第一为“登山讲道”前的所谓“博爱”与“宽容”：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”（《马太福音》五·三八—三九）；第二为“登山讲道”后的破除家庭伦理：“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”（《马太福音》二三·九）。“兄弟要陷害兄弟，而置之死地，父亲要抛弃儿子，而置之死地。儿女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”（《马太福音》一〇·二〇）甚至在门徒的父亲死后，耶稣竟对他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随我罢。”（《马太福音》八·二二）就连面对自己的母亲时，耶稣也冷漠地说道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（《约翰福音》二·四）

遗憾的是，几乎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不敢触碰基督宗教违逆人性的这一面，唯有罗素在其《西方哲学史》中强调，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。同时，罗素在《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》一书中也指出：“从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起，基督教就宣传反犹太主义。十字军的宗教炽情导致了西欧的大屠杀。”此外，罗素也表示，耶稣“登山讲道”前的所谓“博爱”与“宽容”，“并不是什么新的箴言或新的原则。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，老子和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谕，但是实际上，

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种原则”。

事实上,这一特征也可以在历史遗迹的斑驳与残缺中得到印证,它们曾经饱受基督教的摧残。譬如,我游历希腊时目睹的举世著称的德尔斐神庙、奥林匹亚和雅典卫城,都曾遭到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徒的损毁。当然,还有被倚仗着坚船利炮的英法联军掠夺并烧毁的圆明园。可以说,基督教的极端性与独断性以及耶和华的战神作风,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。这使我想到阿敏·马洛夫(Amin Maalouf)《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》的记述:1099年,西方铁蹄长驱直入巴格达,一村一村地进行着掠夺和屠杀,中东与西方就此结下了千年的仇恨。他们掠夺、屠杀的暴行也使我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景象。耶稣说:“我来,并不是叫地上太平,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”(《马太福音》一〇·三四)我想,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终究还是宗教。

这就是基督教以景教之名传入中国的一千多年来,都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的深层根源——其唯我独尊的神权意识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格格不入。

三、中国儒释道文化传统中的人文情怀

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源自殷周之际宗法伦理影响下的祖先崇拜传统。其中,核心的观念在于“德”与“孝”。《诗经·卷阿》云:“有孝有德,以引以翼。”“德”是天人交通的要素,而“孝”则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。西周初年,这种人文的传统经周公制礼作乐而制度化,由政治层面普及至社会阶层,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极具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。在人文思想的激荡之下,孔子和

老子一方面分别将鬼神放置于人道和天道之下,另一方面着重阐发“德”、“孝”的理论内涵,如老子的“孝慈”和孔子的“孝悌”、老子自天道论“德”与孔子自人道论“德”等等。可以说,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年而存蓄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,散见于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日用常行中。

同时,中国本土的道教,通过神仙谱系显露其人间化、人性化、人情化的一面;传自异域的佛教,经由庄子思想的接引而衍生禅宗的流派,并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。儒、释、道三家多元并存且相互激发。与基督宗教的不宽容和排他性相比,中国的人文宗教更加涵容。

可以说,《耶稣新画像》是第一本以《圣经》的文本作为依据,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进行反思的作品。我创作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,其实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,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。

是为序。

陈鼓应

2015年9月18日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室

补记:

《耶稣新画像》于1970年出版前后,我的观点引起巨大回响,催生了一批评论性的文章。大学杂志社编辑部将这些文章汇编成《〈圣经〉的批判与辩护》一书,由台北环宇出版社于1971年

6 耶稣新画像

出版。借《耶稣新画像》这次再版的机会,我从中选出九篇文章作附录,以方便读者参阅。

陈鼓应

2016年11月17日

《耶稣新画像》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版序

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小时候的生活习惯、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。

谈到我自己对宗教的态度,首先使我想到的是祖先崇拜。它在中国有很长远的历史,最早可以追溯至殷周时代。在我看来,在各种宗教信仰中,祖先崇拜是最富有人性和历史意识的。我是在闽西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。每逢佳节村人们总是聚集在陈家祠堂,在家祠里焚香礼拜,在下堂两旁敲锣打鼓、吹笙箫唢呐,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,时而嬉戏追打,时而静听大人讲述我们历代祖先来到这个村落耕耘开拓的故事。过新年时,家里总要左右悬挂两幅祖先的画像。清明时节,大约有二十多天,小孩都跟随大人去山丘扫墓,祭拜祖先。这种对祖先的怀缅之情,很自然地刻在幼小的心灵里。

十四岁那年,有一次我随大人在城里游走,他们把我带进一所教堂。有一个人在讲坛上说个不停(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牧